

明清江南蚕桑生产及其行销路径 与社会效应分析

杨 虎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明清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蚕桑业迅速发展,形成以太湖、杭州、嘉兴等地区为中心的丝织品生产基地。江南所生产的丝织品通过内地航运和陆路运输到广州等地,再经这些口岸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海外。而在海内外市场对江南丝织品需求的刺激下,江南的蚕桑生产技术不断改良、生产规模扩大,出现了以蚕桑生产为主要行业的专业市镇,强化了江南社会中市镇与农村的关系,也加快了江南蚕桑生产的商品化过程,为江南农村近代化奠定了前提基础。

【关键词】明清;江南;蚕桑;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2-0108-07

Jiangnan Se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Marketing Route and Social Effect

YANG Hu

(Marxism College,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region in Ming and Qing, its sericulture industry developed rapidly, forming Taihu Lake, Hangzhou, Jiaying and other regions as the center of silk production base. Silk produced in Jiangnan were delivered by inland shipping and land transportation to Guangzhou and other places, then sold overseas through these port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timulated by overseas markets demand for Jiangnan silk, sericulture production technology improved, production scale increased, the town of professional majoring in sericulture appeare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wns and rural in Jiangnan society, speeding up the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of Jiangnan sericulture production, providing a certain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Jiangnan rural society as well.

Keywords: Ming and Qing; Jiangnan; sericulture; maritime silk road

江南地区早在 700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植桑养蚕,考古发掘中大量出现的丝织品的遗存表明在 4700 多年前,江南地区的蚕丝品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地步,已经能够生产较为精美的丝织品。但由于宋元之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江南地区蚕桑业的发展也较为缓慢,生产技术的发展速度较慢。宋元之后,随着传统农业生产中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经历了初步的开发,江南的蚕桑业也得

[收稿日期] 2016-01-26

[基金项目] 2015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苏南蚕丝生产与农村近代化进程研究”(15LSC007);2014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基金项目“近代苏南蚕丝改良与乡村近代化研究”(2014SJD742)

[作者简介] 杨虎(1980-),男,博士,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史、蚕桑史。

到了较好的发展,江南逐渐成为全国的丝绸中心,取代北方的蚕桑生产成为“丝绸之府”。到明清时期,江南蚕桑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已经较高,江南的蚕桑丝织品不仅在国内销售数量巨大,还远销海外,形成了国内和国外两个销售市场,明代学者感叹:“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①,江南的丝织品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而闽粤一带清初并不生产蚕丝,为了满足海外出口的需要,大量的闽粤商人来到江南,“闽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②。通过闽粤商人,江南丝织品走向海外,其实早在明代,江南地区的南京作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港之一,郑和船队已经开始在江南地区筹备丝织品作为海外贸易的原料。

一、明清江南蚕桑业的发展

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两宋时期,两宋政府对植桑养蚕十分重视,为了限制对桑树的砍伐,鼓励植桑,宋政府下令“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③,在政府的征税制度中,丝织品也以实物的形式作为缴纳赋税的重要形式,这也客观上刺激了江南蚕桑业的发展。这时期在整个政府收缴的丝织品的税赋中,两浙路以及江南东路上缴的丝织品已经居于全国的首位,上缴的丝织品形式多样,主要有罗、绢、丝等,并且两宋政府都开始在江南地区设置专门的征缴机构来保证政府对丝织品的需求。到明代之后整个江南地区蚕桑业的生产更是遍地开花,在当时杭嘉湖三个府的23个州县的地方志中,都有植桑养蚕的记载。

在明代中期之前,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主要集中在环太湖地区,主要包括浙西以及太湖东部的杭嘉湖平原地区,以及苏州府下辖的靠近太湖的地区。具体地说,湖州府的蚕丝业最为发达,该府六县一州均有蚕丝业生产,尤以吴兴(归安、乌程二县)、德清最繁盛,其地方志记载也详细。武康、长兴、安吉等县嘉靖年间(1522~1566)蚕丝业也很发达。湖州在明初已经大量植桑,湖州下属的各县都有“城东南有桑墟,其处尤多”,伴随着植桑养蚕的发展,湖州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蚕丝基地,尤其是“菱湖、洛舍第一”^④。而湖州的吴兴各乡“尺寸之堤,必树之桑”^⑤,甚至出现了“桑麻万顷”的景象,乌程等乡因为从事桑蚕业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归安东乡“业织”,“菱湖业蚕”。嘉兴府的蚕丝业仅次于湖州府,该府七县中有五县都有蚕丝业的记载,其中以靠近湖州府的秀水、嘉兴、崇德、桐乡等县的蚕丝业最发达。东部的嘉善县也有蚕丝业,但发达程度要次于前四县,此时的海盐、平湖二县还没有蚕丝业。德清县的蚕丝业也于明初之后开始发展,“各乡桑柘成阴,蚕缲广获”,武康每家每户都养蚕,“务农桑而无旷土”,安吉每到新丝生产的季节吸引各地的客商,以至于“南京贸丝者络绎而至”。明中前期江南这种遍地桑蚕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嘉兴府、杭州府以及苏州府的吴江、长洲、吴县、太仓等地。杭州府处于本区的各县都有蚕丝业。苏州府也是靠近湖州府及太湖沿岸的地区蚕丝业发达,该府所属各县虽有绫等出产,但无详细记载。太仓州此时已有人养蚕,然而只是取茧入药而已。松江府与常州府还没有关于蚕丝业的记载。明中期之前江南地区的蚕桑种植的收益远远高于种稻,同时北方蚕桑生产减少,以湖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蚕桑生产中心。

明末到清初江南地区蚕桑生产的范围还在扩大,清初康熙南巡的时候“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⑥以前不从事蚕桑业的其他县市也开始植桑养蚕。随着蚕桑生产规模的扩大,蚕丝生产技术也不断进步,各地来江南地区收蚕丝的商人络绎不绝,“茧丝既

① 张瀚:《松窗梦语》(序于万历21年,1593)卷4,第22页。

② 雍正朱批谕旨,卷200,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胡凤暈奏。

③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④ 万历《湖州府志》卷3《物产志》。

⑤ 乾隆《湖州府志》卷37《蚕桑》。

⑥ 乾隆《杭州府志》卷首《天章·桑赋》。

出,各负至城,卖与郡城隍庙之收丝客。每岁四月始聚市,至晚蚕成而散”^①。其中湖丝更是成为江南蚕丝中的佼佼者,“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湖州还出现著名的“七里丝”,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记载:“湖丝唯七里者尤佳”。除了蚕丝之外,江南地区绫、罗、纱、绸等各种丝织品行销全国,而苏州、杭州和南京成为当时的丝织品生产中心,明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丝织品生产的管理,强化征收地方的高质量丝绸制品,成立了地方织染局。在明政府设立的23个染织局中,有16处位于浙江和南京,这也说明浙江以及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在当时丝织品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为加强对江南丝织品生产、征收的管理,明清政府都在江南各地设置染织局,各个染织局每年都会按照一定的数量为朝廷提供丝织品以满足需求,《明史》载:“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亦各有织染局,岁织有定数。”^②明初江南的主要丝织品生产地都已经设置了染织局(详见表1)。位于镇江的染织局在明代“岁造各色光素串四串五绞丝1440匹,闰年加120匹,其中大红暗花细花八宝骨朵云地144匹,每匹价银7.3两,织金胸背犀牛海马熊黑青绿259匹,闰年加24匹,每匹价银4.1两,光素青绿1037匹,闰年加96匹,每匹价银3.6两,加上缎匹解扛银,三项合计用银共6446两”^③。位于苏州的苏州织造局的生产任务则是“岁造缎匹,供朝廷内消费”。苏州织造局织造的产品“只供内府之用,赏给诸项,概隶之府,而局不与焉……生产的定额,在明初题定每年额造上用常课绞丝一千五百三十四匹,遇闰月该造一千六百七十三匹”^④。这样的织造机构遍布江南各地。通过这些遍布江南的织造局,明清政府将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同时染织局的出现也推动了江南丝织品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质量的提高。

表1 明江南所设染织局统计

染织局	织造任务	开办时间
杭州府织染局	缎匹共3694匹,其中绞丝1980匹、罗826匹、绸528匹、纱360匹,有闰加165匹	洪武二年
湖州府织染局	岁造绞丝纱绫共1380匹,有闰加至1495匹,其中绞丝520匹、银丝纱暗花300匹、熟绫暗花560匹	
嘉兴府织染局	各色绞丝共1080匹,有闰加73匹,其中串四886匹,串五200匹,到嘉靖年间闰年加250余匹	永乐年间
松江府织染局	绞丝1167匹、大红织金云鹤狮子50匹、青绿织金(熊黑、海马、犀牛)222匹、青绿光素895匹,遇闰加浅色素段97匹	洪武初年
苏州府织染局	青红二色绞丝1534匹,花素相半	洪武二年
宁国府织染局	绞丝共696匹,其中青绿素缎557匹,织金、熊黑、海马、犀牛、胸背段139匹,每闰月增织素缎47匹,织金缎11匹	明初
镇江府织染局	各色光素串四、串五1440匹,深青448匹,黑绿480匹,大红72匹,丹红480匹,桑丝26觔,闰加120匹;嘉靖十六年时,变为岁造缎匹大红暗花细花八宝骨朵云地,不计闰月额造140匹,织金胸背犀牛、海马、熊黑、青绿,无闰月加造250匹,有闰月加造24匹,光素青绿无闰月加造1317匹,有闰月加造96匹	
扬州府织染局	绞丝131匹,阔生绢701匹,绸300匹,后改为绞丝230匹,生绢701匹,土丝701两,闰俱不加	
常州府织染局	深青黑绿丹红三色织金花素绞丝200匹,闰加17匹	

资料来源:魏文静、夏维中、汪亮《从岁造任务看明代地方织造的兴衰变迁》,《丝绸》2014年第3期。

① 顾禄:《清嘉录》卷4。

② 《明史》卷82,《食货六·织造》

③ 康熙《镇江府志》卷7、卷16。

④ 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二、江南蚕丝品与海上丝绸之路

明初随着传统丝织品产地的衰落,江南地区的丝织品成为国内和国际市场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各地的商人集聚在江南,“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缁币”^①。当时人也记载杭州“茧丝绵纩之所在,四方咸取给焉”^②,嘉兴府也是“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③,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将江南的丝织品输送到全国各地。江南丝织品在国内贸易的路线,向北主要是通过京杭运河北上,再经过陆路和水路输送到辽东、山西、张家口、河北、山东等地。在辽东,市场上所销售的丝织品主要来自于江南地区,由于“南货缁布”的涌入,一时间边缘之地出现了“尚奢侈”的风气。山西大同的丝织品也大部分为“东南之产”。在河北“行货之商皆贩缁、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缁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④,张家口也是“市商缁布、狐皮一切杂货,来自苏杭、湖广”^⑤。除了销往北方之外,江南的丝织品还大量通过长江水道销往传统的丝绸重镇四川,在四川东部“一丝一帛,上取给四川,下资之吴越”^⑥。四川本身的蜀锦由于当地蚕桑业的衰退,市场被江南的丝织品所取代,江南丝织品在与四川传统丝织品的竞争中,占据了四川的市场,在四川的建昌等地“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被,而彼处先得”^⑦。

国内市场只是江南丝织品销售的一个渠道而已,江南的丝织品早在三国时期就通过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明初在实施海禁的同时,政府积极推动官方的海外交流,尤其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郑和在1405到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在多次的海外交流中,扩展了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明代形成了以广东—日本、广东—东南亚—印度—欧洲、广东—菲律宾—拉丁美洲—欧洲等为主体的海外丝绸之路的路线。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点,此外,南京由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始发地,在明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中丝织品成为重要的产品,而江南的丝织品是广州等地出口的各种丝织品中的上品,在欧洲、东南亚以及日本市场,“皆好中国绫罗杂缁,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觔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⑧。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大量广州、福建一带的商人涌向江南地区,开拓了江南到广州的多条运送丝织品的线路,这些商路主要由江南经过浙江,渡过钱塘江,采取陆路和内河航运的方式,到达福建;另外一条是陆上自浙东、经江西到广东,或是从南京出发,进入安徽沿陆路经过江西,进入广州,再或经浙东的海道到福建、广州。最后的海道是明代中后期之后江南丝织品运往广东最主要的路径^⑨。江南到广州地区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江南丝织品的海外出口奠定了基础,尤其是1757年之后清政府实施了更为严格的丝织品出口的广州一口岸通商政策,江南的丝织品只能通过广州进行海外贸易。

通过闽粤以及江南各地商人,江南的丝织品通过广州等口岸与海外的市场联系起来。明代一直到

①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6。

②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

③ 王穉登:《客越志》。

④ 嘉靖《河间府志》卷7《风土志·风俗》。

⑤ 梅国祯:《请罢榷税疏》,《皇明经世文编》卷452。

⑥ 黄密:《荒书》附《重庆府佛图关新建蚕神记》。

⑦ 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

⑧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分册。

⑨ 范金民:《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清前期,江南销往日本的丝织品主要是蚕丝和其他丝织品,根据日本学者藤本实所著的《日本蚕丝业史》所载,在17世纪以后,每年销往日本的蚕丝在两千担的水平,最高时期达到3000担^①,虽然其中对江南丝织品的具体数量没法计算,但由于当时全国其他地区的蚕丝生产已经衰退,江南的蚕丝应该占到蚕丝的主体。到1711年输入到日本的蚕丝共计50276斤,丝织品202149匹^②。在美洲市场,每年到此的蚕丝量根据学者的估计在3000担到5000担。根据1750年的统计,输入到英、法、荷兰、瑞典以及丹麦的生丝1379担,丝织品18229件,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江南蚕丝出口较多的是丝织品。

1757年清政府实施了广州一口岸通商政策,除了广州之外其他地区不允许进行海外的贸易,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江南丝织品的海外销售更多地依靠广州口岸。而“从广州出口的丝货多由江南地区生产出来”^③,除了直接从江南地区贩运丝织品之外,广州的商人也开始大量贩运生丝到广州进行加工,同时由于清政府对蚕丝的贩运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管理,禁止江南的丝织品通过海道运往广州,传统的江南到广州丝织品路线发生改变。在清中期江南到广州的丝织品贩运主要有三条路线,分别是:从苏州出发沿运河北上到镇江,由镇江沿长江经过南京、安徽最后进入江西,经江西赣州南下到广东保昌县,最后达到广东;另外一条是从浙江杭州出发沿钱塘江南下到常山,经陆运至江西玉山,由河运和陆运相结合的方式运送到广州^④,最后一条线路是同样从杭州出发,经富阳、桐庐、祁门进入江西,再通过赣江运抵广东^⑤。较明代形成的江南丝织品贩运广州的路线,广州成为江南丝织品到达的唯一的目的地,贩运的路线由于禁止海运,陆路和河运相结合的方式,导致贩运时间和经济成本都较高。

三、江南蚕丝海外需求的社会效益

明清江南丝织品贸易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市镇经济的繁荣,市、镇在我国唐代以前是不同的功能性单位,市是一个商业性功能的行政单位,逐渐成为商家进行商品交易的地方。镇则不同,镇是一种军事性的单位,政府在镇驻兵以保卫地方的安全,镇作为军事性的驻地,较少有居民居住,但宋代之后,镇的军事功能由于政府加强对军权的控制而丧失,镇逐渐成为同市一样的居民的聚集地,并且随着明清江南蚕桑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化的商业单位。学者统计了明嘉靖、万历年间及清乾隆、嘉庆年间苏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常州府以及松江府的市镇数量,对比发现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尤其是蚕桑生产发展较为迅速的苏州、杭州,市镇数量更是成倍增加。

表2 明清江南地区市镇变化统计

市镇	市镇数量对比		市镇	市镇数量对比	
	嘉靖到万历	乾隆到嘉庆		嘉靖到万历	乾隆到嘉庆
吴	6	7	钱塘	4	13
长洲	8	7	仁和	10	14
元和		9	海宁	5	9
吴江	6	10	富阳	5	5
震泽		5	余杭	6	8

① 藤本实《日本蚕丝业史》,1933年。

② 日本长崎港《唐蛮货物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③ 范招荣《江南丝货的广州外销1757-1842》,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④ 新编《玉山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6页。

⑤ [明]黄汁《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

续表 2:

市 镇	市镇数量对比		市 镇	市镇数量对比	
	嘉靖到万历	乾隆到嘉庆		嘉靖到万历	乾隆到嘉庆
昆 山	8	10	临 安	6	10
新 阳		4	新 城	4	6
常 熟	12	12	于 潜	0	1
昭 文		23	昌 化	2	5
苏州府	40	87	杭州府	42	71
太 仓	14	12	嘉 兴	4	4
镇 洋		9	秀 水	4	4
嘉 定	15	18	嘉 善	4	7
宝 山		11	石 门	2	2
太仓直隶州	29	50	桐 乡	3	7
华 亭	22	8	海 盐	4	6
娄		10	平 湖	5	9
金 山		13	嘉兴府	26	39
奉 贤		8	乌 程	4	6
青 浦		33	归 安	5	5
上 海		15	德 清	2	2
南 汇	22	16	长 兴	5	5
川 沙		6	安 吉	3	3
松江府	44	109	孝 丰	0	1
武 进	3	5	武 康	1	2
阳 湖		2	湖州府	20	24
无 锡	7	5	合 计	226	410
金 匱		5			
宜 兴	4	2			
荆 溪		4			
江 阴	11	7			
常州府	25	30			

资料来源 转引自 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江南市镇数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蚕桑生产的发展和 专业丝绸市镇的出现。盛泽镇就是江南丝绸经济的产物,根据《盛湖志》记载,盛泽镇在明初还只是一个较为荒凉的小村,“为青草滩,一荒村耳”,此后由于江南丝绸业的发展,盛泽镇由于距离江南丝绸业的中心湖州和杭州较近,很快成为湖州和杭州丝绸业发展所需蚕丝的重要供应地。“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丝绸商人从全国各地齐聚盛泽镇,明清时期江南的丝绸生产大多集中在镇以上的区域中心和中心城市,但作为丝织品的原料来源,蚕丝的生产一直是在市镇以下的农村进行的,由于受到当时的交通距离限制以及存在的经济圈的影响,农村的蚕农大多只是将蚕丝拿到市镇上进行交易,丝绸行在盛泽加工蚕农的蚕丝,盛泽建起大量的丝绸作坊,“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①,到明末盛泽镇上专门从事丝绸买卖的牙行已达上千家,由此可见盛泽蚕桑业发展的规模。正是由于丝绸业的发展,加之优越的地理环境,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18。

盛泽在嘉靖年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百家居民的小市镇,而到明末盛泽“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冠”^①。

湖州的菱湖镇同样经历盛泽的发展过程,该地在唐代也只是一个以养殖菱芡为主要产业的小村,此后由于交通方便明初开始设置税课司,作为对周边进行征税的机构驻扎地。菱湖镇的发展也是始于明中期,作为湖州丝绸业发展的原料来源,菱湖在明正嘉隆万间“第宅连云阗阗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无剩水矣。”^② 蚕丝业已经成为菱湖镇重要的经济支柱,菱湖镇同盛泽镇一样成为江南众多的丝绸专业镇,“沿湖岸铺及湖内月船商资凑集,总之各行不下百余户。”^③ 而双林镇在明初也只是一个小村落,此后江南蚕丝经济的兴起,刺激了双林镇市镇经济的崛起,双林镇成为商贾聚集之处,双林镇人多“以织绢为上,习此者多而出息亦巨,机声鸦轧,晓夜不休”^④。近镇乡民,“沿双溪左右延袤数十里,俗皆织绢”^⑤。江南丝绸外销对丝绸需求的增加,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市镇蚕丝经济的发展,专业的丝绸市镇大量出现,在江南乡村社会中发挥了作为经济发展的节点的作用,作为丝绸生产和原材料集中的起点,将周边乡村中丝绸原料集中进行生产,以满足海上丝绸之路对江南丝织品的需求。

同时在丝织品需求和生产的推动下,市镇与周边乡村的关系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在宋元之前,市镇对周边的乡村并不存在行政上的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同样,市镇不是作为行政管理结构,与乡村整治管理上也没有完善的管理关系。但在江南的蚕丝经济结构中,江南市镇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乡脚”关系。乡村社会作为市镇经济发展的补充,为市镇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尤其是生丝、蚕茧等蚕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料,蚕农通过市镇进行蚕茧等农产品的交换,市镇则吸引乡村的原材料,通过发达的手工工业,生产南京、杭州、苏州等丝绸中心所需要的初步加工的原材料,并且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甚至有取代这些丝绸中心从而成为更接近原材料生产基地的丝绸生产中心的趋势,这种地理上和原材料上的便利条件,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江南市镇与周边乡村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这也是在海外市场对江南丝绸需求的日益增加下,对江南乡村社会的改变。

两宋之后江南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直到明清时期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蚕桑生产迅速发展,成为国内外市场上重要的丝绸中心,并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行销到东亚、南亚以及美洲、欧洲地区,初步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生产市场。江南地区生产的生丝、丝绸等丝织品通过这个行销路径,输入到国际市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之上重要的商品。在这样的行销格局中,由于估计市场和江南地区的沟通加强,江南的蚕桑生产和行销构成了较好的产业链系统,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广州的一口通商,在广州丝织品生产有限的情况下,在通过海上路径销售到国际市场的丝织品中,江南的丝织品成为其中的上品。江南丝织品这种行销格局的形成,对江南的传统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市镇崛起,乡村经济繁荣,以市镇为中心,乡村为滋养的乡脚格局形成,加强了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构建了明清时期江南蚕丝经济的格局。

(下转第 14 页)

①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第69页。

② [清]孙志熊《菱湖镇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③ 董斯张《吴兴备志·风俗》。

④ 同治《双林镇志·风俗》。

⑤ 同治《双林镇志·风俗》。

[参 考 文 献]

- [1] 李长年. 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油料作物[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60.
- [2] 孙中瑞, 于善新, 毛兴文. 我国花生栽培历史初探——兼论花生栽培种的地理起源[J]. 中国农业科学, 1979 (4).
- [3] 王在序, 毛兴文, 于善新. 山东花生栽培历史及其发展的探讨[J]. 中国农史, 1987 (4).
- [4] 袁剑秋. 中国油料植物小史[J]. 古今农业, 1996 (2).
- [5] 郭文韬. 试论中国栽培大豆起源问题[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6 (4).
- [6] 王宝卿, 王思明. 花生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J]. 中国农史, 2005 (1).



(上接第 114 页)

[参 考 文 献]

- [1] 陈学文. 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 (4).
- [2] 田 龄.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 (3).
- [3] 项文惠. 明清杭嘉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之演变[J]. 江苏社会科学, 1991 (5).
- [4] 罗 婧. 世界市场与苏嘉湖蚕桑丝织经济圈[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0 (10).
- [5] 樊树志. 明清江南丝绸业市镇的微观分析[J]. 史林, 1986 (3).
- [6] 朱苏南. 试论明清时期盛泽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 (2).
- [7] 陈学文. 明清时期江南丝绸手工业重镇菱湖的社会经济结构[J]. 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 1988 (10).
- [8] 陈友益. 明清湖州丝绸专业市镇群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J]. 近代史学刊, 2005 (1).
- [9] 叶依能.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发展之研究[J]. 农业考古, 1988 (1).
- [10] 叶依能.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J]. 农业考古, 1985 (1).
- [11] 林荣琴.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3 (3).
- [12] 吴 滔. 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J]. 中国农史, 2005 (2).
- [13] 袁宣萍. 明清时期福建与江南地区的丝绸贸易及技术交流[J]. 闽商文化研究, 2010 (2).
- [14] 张海英. 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J]. 浙江学刊, 2005 (1).
- [15] 范金民, 夏维中. 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J]. 史学月刊, 1992 (1).
- [16] 范金民. 十六至十九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 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J]. 明清论丛, 2011 (1).
- [17] 范金民. 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
- [18] 朱大为. 16 至 18 世纪中国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及其社会经济效应[D].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 [19] 范金民, 金文. 江南丝绸史研究[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3.
- [20] 樊树志.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 [21] 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22] CarPenter.Francis Ross.Demi, The Old China Trade: Americans in Canton 1784-1843, NewYork, 1976.